



转型与产权理论探索丛书(第一辑)

主编/周冰

The Collection Explored of the Transi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Theory

钟玉文 / 著

The Logic of Property Rights Evolu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ransition Economy

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 演化的逻辑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丛书（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转型中国国有企业产权 演化的逻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转型与产权理论探索丛书》

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

钟玉文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钟玉文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6

(转型与产权理论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058 - 9260 - 6

I. ①转… II. ①钟… III. ①国有企业 - 产权 - 研究 -
中国 IV. ①F279. 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398 号

责任编辑: 沙超英

责任校对: 杨 海 韩 宇

技术编辑: 董永亭

转型中国有企业产权演化的逻辑

钟玉文 /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880 × 1230 32 开 9.25 印张 260000 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260 - 6 定价: 22.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丛书序言 •

坚持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原则

就像国人的奥运金牌情结一样，中国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实在是太强烈了。自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时起，林毅夫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切期盼，学界和媒体立即广泛响应，部分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按捺不住激动之情，撰文呼应，一时间似乎中国很快就要出现诺奖获得者了。那么，中国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究竟能否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呢？如果可能的话又是凭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折桂呢？拿2009年的两位诺奖得主来说，他（她）们的获奖作品都是30年前研究发表的成果。自1969年瑞典银行首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以来，迄今共有64位获奖者，从其研究成果发表到获奖的平均时间超过了30年。这就是说，如果预测未来30年内诺奖可能的获得者的话，其研究成果现在就应该已经出现了。环顾当下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以举出类似这种分量的、具有开创性、系统性而又被广泛认可的研究成果吗？不免令人汗颜。

本来，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认识世界获取新知识，人类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则是为了改造世界。由于事物的无限复杂和发展变化，人的有限理性和认识的可错性，对新事物和新知识的探索是一个

永无止境的航程，科学和理论的发展也就永远不会停止。知识就是力量，它会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从而改变社会及其发展演化的道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社会的理论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的高度。正因此，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创造是人的一种本性。科学理论研究的探索性质决定了它从不重复，在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同时，总是在挑战前人和自我，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因此是一种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研究者的最大报偿，研究过程的复杂艰巨和取得成果时的喜悦，就是激励学者不断探索的强大动力，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满足了自己强烈的好奇心，而且也实现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价值，为人类社会知识的发展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凡是真正的思想产品，社会总会以某种方式承认的。至于奖励之类，只是社会承认的一种方式罢了，实际是科学理论研究结果的一个副产品。副产品当然也有其价值，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绝不当本末倒置，喧宾夺主，淡忘了科学和学术研究自身的目的。更何况，奖励作为科学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刺激催生出更多研究成果的同时，实际也在控制、引导和限制着科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诱导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排斥和扼杀着真正的学术兴趣和学者个人的选择自由。过多和过度使用奖励机制对科学和理论的发展弊大于利。

中国当然应该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又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经过30年高速增长，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正受到越来越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

越多的关注，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有了世界性的意义。毛泽东在论文艺时曾说过：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过去的文学作品不是源而是流”^①。其实，这话同样适用于科学和理论的研究。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杨振宁认为，科学，即使最纯粹的理论科学，也是从实际现象和社会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形成理论的。如果没有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思想理论的渊源，学术的发展就难以达到深邃浩瀚的境界，难以形成蔚为大观的气势；如果不是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提出问题，科学的生命就将枯竭。什么人能成为重要的甚至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那些研究了影响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乃至人类福祉的最重要经济现象的人。当今的中国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这种历史性的机遇。

但是，把握住机遇不仅需要有时代的责任感和理论勇气，而且还要有心智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理论研究的主体性，这就是，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明确中国的立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分理论流派，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各种经济学说，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进行理论研究，并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近年来流行的说法是，中国经济学研究要现代化、国际化和本土化。然而，科学理论虽然有着新和旧的区别，但是却并不存在所谓的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存在的只是解释力的强弱和对所研究的问题是否适合及其程度大小的问题，因此，所谓经济学现代化的说法是很荒谬的。所谓国际化，实际就是理论研究要以北美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本位，而为了使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能够适合中国的需要，所以要将其本土化。这种主张颠倒了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源和流的关系，因此是不可取的。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817页。

理论是思维的强大工具，认识任何复杂的事物都不可能离开理论思维，但是，理论作为人的思维的主观创造物，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这就是它的倾向性和可错性。任何理论，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都依赖着它所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可能摆脱历史和制度的制约。理性思维需要借助理论概念作为思维的语言符号系统来进行，但是作为语言概念系统，理论始终和它所反映的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距。任何理论，都代表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一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一种立场和观念，完全客观和中性无偏的社会科学理论是不存在的。理论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接受，就具有了支配力量，就有了话语权，就会在无形中影响人们的思维，因此在提高人们思维能力的同时，也在遮蔽和扭曲着人们的视线，使人们难以认清面对着的事物的真相。因此，只有透过一切既有理论语言的迷雾，才能真正看到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事实及其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概念，发展理论。为此，我们主张以不群不党、不帮不派的态度对待发展到今天的各种经济学理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吸收和融会贯通，用来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建立以中国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进而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这个学术团队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从事中国经济转型的理论研究的。我们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发现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那些最具特色并对现有理论构成挑战的现象，努力挖掘和揭示出其中所具有的原创性理论含义，试图以此来促进转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前一个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层次的各个方面，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转型经济学理论前沿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共8本）中。目前，我们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产权制度及其变革的理论，因此现在这套书定名为“转型与产权理论探索丛书”这套丛书和前一套丛书是姊妹篇。收入本丛书的各部著作，除了由我主持的研究课题的成果之

外，都是在我指导的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其中少数延续了对体制转型的宏观研究，更多的则是以中国体制转型为背景进行的产权理论研究，也有以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为重点的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结束，因此本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这些研究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产权主体、产权客体或者产权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探索，是对产权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制度现状的理解，可供各方面的研究者和学习者阅读参考。这套丛书是我们在转型和产权理论上的探索，不成熟和不完善之处，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斧正，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未来中国出现可以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成果铺路添砖。

周 冰

2009 年冬至

内容摘要

中国国企经过 30 年的改革，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罗斯的道路。它在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并没有像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从竞争性行业中全部退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规模 and 影响力虽然一度在不断降低，但却并没有一路下滑，反而在现阶段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关键行业都确立了它的领导地位；其经济效益在新世纪初也开始不断提高，利润总额大幅攀升。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似乎将要改变国企搞不好、低效率的传统认识。然而，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层，却很少有人因此认为我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即将大功告成。对中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做出始终一贯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对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现状的准确评价，将有助于揭示国企产权制度演化的逻辑，从而为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推进寻找一个突破的方向。这是本书的研究目标。

本书通过对前人关于产权研究文献的评述，提出产权结构理论，以此作为全书的基本分析工具。本书还利用博弈论构造一个理论模型，从行为主体进行制度选择的角来解释国企产权制度的演化过程及其持续的阶段性变化，继而对国企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国企产权制度模式进行分析和评价，从而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方向和基本的原则。本书自始至终贯彻了理性人的假设，并基于此提出最高（政治）决策者（以下简称 HPD）的行为目标是统治权的稳固，具体到中国的 HPD，其行为目标是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对效率和财政收

入的追求都服从于并服务于此目标。但 HPD 要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并且至少要达到最低水平。由于平滑转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体制转型，它表现为等级地位下的利益博弈，因此，HPD 的行为目标是决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利益博弈均衡的最关键因素，其他行为主体对利益追求及其利益的实现程度都取决于他们在实现 HPD 行为目标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项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相应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构建的，因此国企的各项经济权利基本上都被政府所掌握或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然而，这种产权制度无法长期有效地激励人们生产性劳动的支出，所以并没有实现 HPD 预期的经济目标，社会公众的生活水平也处于极低状态，从而危及到执政者的地位。HPD 不得不进行产权制度变革。传统国企是大一统的等级组织。从微观上看它是一个个的单位，但从宏观上来看，它就几乎是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对国企进行产权制度变革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国企内部产权配置关系的变化，它经过放权让利、承包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另一方面是国企在整个社会产权中比重的变化，它经过所有制的增量调整和国企存量的战略布局调整两个阶段。这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互相影响，但并不完全同步推进。在每一个方面的不同阶段，国企的产权制度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又确立了短期的均衡框架，从而使国企产权制度变革历经放权让利、承包制、所有制结构增量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国企战略布局调整五个环节。这使 HPD 所拥有的国企产权呈现出由强到弱，再由弱增强的过程。

HPD 为了执政者地位的稳固，必须改善企业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但维持自己对企业原有的产权又无法实现这些目标，这迫使其不得不为了换取企业效率的改善而进一步下放企业的控制

权和收益权。由于 HPD 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们并不能在事前就通过契约界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风险承担者。在契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承担风险的就只能是所有者，而且只有相应的产权主体以及所有者才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 HPD 为了规避风险不得不进一步向效率主体放权，从而使国企产权制度不断变革，事后风险转移成了推进国企持续改革的主要动力。

HPD 对国企控制权和收益权的转移实际上是为了降低他们控制企业的成本，提高由他们控制的企业的效率，而不单纯是为了效率的改善而提高企业的效率。对于风险转移，也同样如此。他们的目标在于减少承担由他们控制的企业的风险，但并不纯粹地把所有的风险都转移出去。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国企因其内在的制度缺陷而普遍陷入困境，国企在竞争中不断地丢失阵地，从而使得 HPD 控制企业与企业效率提高、保留所有权与转移风险双重目标的冲突加剧，它们的不可兼容性在一些高度竞争性行业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迫使 HPD 开始思考国企的功能定位。由于制度知识的局限和意识形态的约束，HPD 在错位的功能定位的引导下，一方面，开始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和夕阳产业，并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推动下，加速了国企的（法律）所有权变革。由于（法律）所有权的变革意味着职工对企业财产的收益权将被彻底剥离，所以职工就业压力成为减缓国企（法律）所有权变革速度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HPD 加强了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公益性领域国企的控制，并且为了提高国家控制之下的企业的效率和效益，确保它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普遍采用股份制+集团公司模式的新国企制度安排。

新国企只是 HPD 为了实现特定的控制功能，对国企进行部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所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国企的内在制度缺陷也就逐步暴露出来。此外，新国企错位的功能定位与提升国民的福利水平也相悖。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新国企的产权制度安排难以满足相关参与主体的目标，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资源配

置效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它显然有悖于 HPD 维护政权稳定的目标，与实现 HPD 满意的经济目标的冲突必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而显性化。所以，它必将被新的产权制度变革方案所代替。根据前面的分析，本书得出国企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国企新的产权制度变革方案必须要以适应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打破行业垄断，建立一个平等开放的产权制度；着力实现公有产权的资本化、价值化，并通过国企信息的公开化等披露制度降低监督成本，加强社会公众或所有者代理人对企业的监督；努力实现把国有资本的收益惠及全体社会公众，实现公有产权制度应有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国有企业 产权制度变革 产权结构 HPD 国企功能定位 边际改革 新国企



第1章 导论 / 1

- 1.1 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中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 / 1
- 1.2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理论评述 / 3
- 1.3 本书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 / 16
- 1.4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22

第2章 产权结构理论 / 24

- 2.1 产权理论研究评述 / 25
- 2.2 产权结构理论 / 34
- 2.3 国企的产权结构理论 / 49

第3章 国企改革的目的和动机 / 56

- 3.1 HPD 的效用函数 / 57
- 3.2 国企的功能定位 / 74
- 3.3 中央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目的和动机 / 92
- 3.4 意识形态调整与企业改革的相互作用 / 105

第4章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的边际推进过程 / 118

4.1 国有经济产权制度变革的两个方面 / 118

4.2 国企内部产权制度变革的三个阶段 / 121

4.3 国有经济地位和作用范围的变化 / 143

第5章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155

5.1 HPD 进行产权制度变革的博弈模型 / 155

5.2 国企内部产权制度变革持续推进的动力 / 173

5.3 对国企进行（法律）所有权变革的内在动力 / 183

5.4 职工就业是减缓（法律）所有权变革速度的主要
压力 / 206

第6章 股份制+集团公司的新国企：未完成的国企改革 / 213

6.1 股份制+集团公司模式的新国企 / 213

6.2 国企产权制度变革与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纠葛 / 223

6.3 新国企：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 / 235

第7章 结论 / 256

参考文献 / 262

后 记 / 280

第1章

导 论

1.1 问题的提出：如何理解中国国企 产权制度变革

问题的提出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获得了惊人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已在这一过程中初步建立。这表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已迈出关键的一步。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国企产权制度变革^①就被政府定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过 30 年的探索和实践，国企经济效率实际上一一直在不断提高^②。它在国民经

① 已有的理论研究一般认为产权制度变革是指国企所有权的变革，笔者对此并不苟同。笔者认为正是已有产权理论研究的这种倾向性认识的偏差，导致产权理论对现实中的改革问题解释力不足，因此提出产权结构理论，并且把产权权能细分为控制权、收益权和风险责任三个维度以实现对经济过程中权利关系的微观刻画。它克服了把产权改革等同于所有权改革的弊端，从而不仅能揭示所有权的变化，而且还能揭示所有权不变情况下企业权利关系的变化。所以，本书所说的产权制度变革就并不仅仅指企业（法律）所有权的变革。详细的阐释可参见第 2 章第 2.1 节。

②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虽然理论界对于国企是否有效率作出了不同的判断，但从刘元春（转引自杨瑞龙，2001：19～66）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出现了在微观财务角度的非效率和宏观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并存的局面。然而，国有企业的效率定位不仅仅是单个组织的微观效率，更重要一个方面的是社会经济宏观效率。所以，可以认为国企的效率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高的。

济中的相对规模和影响力虽然一度在不断降低,但却并没有一路下滑,反而在现阶段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关键行业都确立了它的领导地位。在新世纪初国企经济效益也开始不断提高,利润总额大幅攀升^①。中国改革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修正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模式的偏见,以致一些学者把中国的转型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雷默,2004)。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似乎已经改变了国企搞不好、低效率的传统认识。然而,中国仍是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大国,国企改革迄今尚未完成,仍处于攻坚阶段。特别是近几年,因国企产权制度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群体利益矛盾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所引发的全社会范围内各方面人士都参与的大讨论和理论反思,甚至因此而出现了一些否定国企产权制度变革方向和作用的思潮,就是国企产权制度变革依然处于困境的集中反映。因此,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决策部门,几乎很少有人认为国企产权制度变革即将大功告成。然而,为什么中国国企产权制度变革会出现这些相互冲突和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这促使笔者思考以下一系列问题:

在传统体制下,最高(政治)决策者(以下简称HPD,即Highest(Politics) Decision-makers的缩写形式)为什么要对国企进行产权制度变革;在此变革过程中,为什么不是对它进行一次性的

^① 2001~2006年全国国企的利润总额和上缴利税总额分别为:2 811.2亿元、3 786.3亿元、4 769.4亿元、7 368.8亿元、9 579.9亿元、12 193.5亿元、6 682.6亿元、6 794.1亿元、7 865.0亿元、10 086.1亿元、11 736.6亿元、14 000.8亿元。2007年则分别上升为1.62万亿元和1.57万亿元(<http://www.bjinfobank.com/IrisBin/Text.dll?db=TJ&no=402433&cs=1848171&str=中国历年国有企业按基本行业分类统计>; <http://www.bjinfobank.com/IrisBin/Text.dll?db=TJ&no=402434&cs=2277874&str=中国历年国有企业按基本行业分类统计>;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v/20080124/06171957749.shtml>。)